“取镕经义,自铸伟词”

——《离骚》的经典化阐释与清代晚期的《离骚经赋》

宋小芹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屈原《离骚》的经典化历程,具有“经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两个向度,由两汉开启,经由魏晋以讫元明的演进,至清代结束。而晚清文人艾作模、徐有珂、孙贻良三篇同题《离骚经赋》的问世,既是清代尊骚为“经”这一风尚的直接表现,也成为《离骚》经典化进程的最终站点。《离骚经赋》从“骚经”与“骚赋”的双向维度解读《离骚》,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文章表达了对于屈原身世遭遇、精神人格的悲悼崇敬,阐发了《离骚》取镕经义“合于《五经》之旨”的经学意蕴,以及自铸伟词“宜雅宜风”的文学精神;显现了以赋明“经”的律赋艺术创造,如以命题与限韵字提领创作主题,切合赋题选择与楚国相关的典故,大量化用《离骚》语句意象葆有屈骚芬芳幽怨的艺术风味。

关键词:屈原;离骚经;离骚经赋;经典化

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0)05－0057－08

《离骚》的经典化阐释,自汉代以来就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双重发展历程,在大量注释、解读《离骚》的学术论著和多种体类的拟骚咏屈类文学作品中,或体之为赋,或尊之为经,或以为一身二任亦经亦文,或以为自是一体是文非经。由此观之,清代后期以文学形式阐发经典理念的《离骚经赋》的出现,似乎成为了《离骚》经典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离骚经赋》的创作是古代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不仅证明了屈原及其《离骚》“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深远影响,而且从另一个维度反映了清代的学术文化特色。

一、自汉至明《离骚》双向经典化的历史发展

汉代是《离骚》被尊之为“经”和“辞赋宗”而走向经典化的开端时期。最先赋予《离骚》经典品性的,是西汉的刘安和司马迁、扬雄。

淮南王刘安有关《离骚》的评论,最早见于《史记·屈原列传》的记载:

>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P2482)

据班固《离骚序》[2](P49)及刘勰《文心雕龙·辩骚》[3](P35)所载,这段文字出自刘安的《离骚传》。刘安称赞《离骚》兼有《诗经》之《国风》和《小雅》的特点,其崇高地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开启了后来尊《离骚》为儒家之经的先声。

司马迁虽在《屈原列传》里引用了刘安关于《离骚》“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的言句,但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解读《离骚》。他指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又评价《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的艺术特征,还在《报任安书》中提出“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著名论断。与刘安“兼之《风》《雅》”的经学判断不同,司马迁偏重于肯定《离骚》的文学成就,为推动《离骚》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学术基础。

扬雄生活在儒学盛行的西汉末年,是一个奉儒

收稿日期:2020－05－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赋学编年史”(17ZDA240)

作者简介:宋小芹(1993－),女,湖北松滋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家学说为典范的正统思想家。故《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4](P3583)。显然,他尊崇《离骚》在辞赋文学中的地位,就有如《周易》《论语》之于儒家经典。

在刘安、司马迁、扬雄之后,东汉前期班固所撰《离骚序》[2](P49~50),一反刘安所谓《离骚》“兼《诗》风、雅”的经学价值,而更为肯定其“为辞赋宗”的文学地位和影响。班固认为,屈原不遵儒家明哲保身之道,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忿怼沉江,可谓是狂狷景行之士,《离骚》亦多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故《离骚》“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屈原其人“虽非明器,乃妙才”,是宋玉、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等人学而不及的典范。

再到东汉后期,校书郎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5](P2618),则又反驳班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的责难,强调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并且在《楚辞章句》中题名为“《离骚经》”。如其《离骚经章句叙》曰:“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2](P2)

《离骚经章句·后叙》又曰:

> 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孝章继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
>
>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2](P48~49)

王逸批判班固的责难“殆失厥中”,认为屈原乃“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并列举具体诗句证明《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义兼群经,其思想内容与《诗经》《尚书》《易经》等儒家经典相通,又以淮南王刘安、班固、贾逵等人曾“各作《离骚经章句》”加以佐证。①

虽然在王逸之前,无论是刘安,还是司马迁、班固,他们或直接称引“离骚”,或称名“离骚赋”,但并未有称“离骚经”者。《史记》《汉书》等两汉文献中,也未见刘安及班固等人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因此,推究《楚辞章句》之所以直接称“离骚经”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王逸之时已有尊《离骚》为经的学术氛围,上述司马迁《屈原列传》及班固《离骚序》载淮南王作《离骚传》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可证;二是因为王逸一心推崇屈原及其《离骚》之作。所以,身为朝廷校书郎的王逸,在向汉安帝呈奏《楚辞章句》时,为强调《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的正当性和屈原有“人臣之义”的忠贞品格,不仅直接将《离骚》题名为“离骚经”,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后叙》中将刘安、班固、贾逵等人所撰的《离骚》传注均记载为“《离骚经章句》”,以符合其“稽之旧章,合之经传”的编注目的。

不仅如此,王逸还从“文”的角度,深入评析了《离骚》的价值特色:

>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明。[2](P2~3)
>
> 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2](P49)

王逸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将《离骚》推尊为“依托《五经》以立义”的儒学经典和“百世无匹,永不刊灭”的文学典范,正式推动了《离骚》在经学与文学双向维度上的经典化历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也有人如颜之推沿袭班固之言,贬责屈原“露才扬己,暴露君过”(《颜氏家训·文章篇》),但主流的声音仍然是尊崇《离骚》的经典地位。诸如,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评屈原之赋“颇有

---

① 对于王逸所持屈原题名“离骚经”及刘安、班固等《离骚》注均称“离骚经章句”的说法,后世学者颇多怀疑。如洪兴祖《楚辞补注》说:“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朱熹《楚辞集注》也引洪兴祖《补注》之语曰:“其谓之‘经’,非原本意也。”

古诗之义"；南朝张缵《南征赋》赞屈《骚》"合《小雅》之怨辞，兼《国风》之美志"[6](P59)；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将《楚辞》与《诗经》并提，以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然而"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7](P215)。

刘勰遥承三百多年前王逸从经学和辞赋双向角度肯定《离骚》经典地位的思想方法，在《文心雕龙》中专列《辩骚》篇，对《离骚》作出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论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3](P35) 刘勰一开篇，就将《离骚》与"《诗》人"和"辞家"相联系，明确表达了从经学和文学两个层面评价《离骚》的理论倾向。接下去，又历叙两汉五家之说，认为其中刘安、王逸、汉宣帝、扬雄等"四家举以方经"，而班固说"与《左氏》不合，非经义所载"是"谓不合传"。这五家的观点，虽然也各有偏重，有所异同，但皆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在此基础上，刘勰再举例分析《离骚》等作品的诗句内容，分别举出"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等"同于《风》《雅》"的"四事"，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等"异乎经典"的"四事"，最后得出结论：

> 故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义，亦自铸伟词。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故能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才绝艳，难与并能矣。

在屈骚与"经典"的关系上，刘勰认为《离骚》既有同于经典之处，又有异乎经典之处，可谓是"虽取镕经义，亦自铸伟词"，从而颇具辩证意味地评价了屈骚在继承经典的同时又别具独创性的经典价值。就文学价值而言，刘勰进一步充分肯定屈骚"惊才绝艳，难于并能"的艺术成就以及"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深远影响，高度赞叹："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3](P36～37) 刘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经学和文学两个方面认识《离骚》的经典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晚于刘勰并且受到过《文心雕龙》影响的萧统，编辑《文选》时却与刘勰强调"征圣、宗经"有所不同，而注重"以能文为本"。他选录既"事出于沉思"又辞采华美的作品，在刘勰"辩骚""唱骚"(《诠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楚骚作品独立为与"赋、诗"相区别的"骚"体，收录《离骚》及《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等作品。

唐宋以降，《离骚》的经典化历程，继续在不同意见的论争中向前推进。如唐代，既有古文运动前驱者李华"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柳冕"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8](P130) 的批评；也有盛晚唐诗人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江上吟》)、皮日休称"屈平既放作《离骚经》"(《九讽系述》)等肯定之声。可以说，"唐诗与楚辞的精神血脉是相贯通的"，"《楚辞》之于唐代诗人葆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楚辞与唐诗的关系'犹表之与影，若音之与响'"。[9](P249～250)

北宋时期，苏轼手校《楚辞》十卷，创作有《屈原塔》《屈原庙赋》，晚年还在《与谢民师推官》中，肯定"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0](P331)。晁补之集《重编楚辞》《续楚辞》和《变离骚》等楚辞三书，在《重编楚辞》中收录"《离骚经》"等作品，又言"《诗》亡而后《离骚》之辞作"，"自《风》《雅》变而为《离骚》，至《离骚》变而为赋"。[8](P179～180)

南宋楚辞学家洪兴祖和朱熹，虽对于屈原称名"离骚经"有所质疑，却认为是"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2](P2)。朱熹不仅在其《楚辞集注》及《楚辞辩证》中称《离骚》为"骚经"，也以《诗经》之"变风""变雅"阐释《离骚》。如其《离骚经》题注说："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11](P2) 比朱熹稍后，高似孙撰《骚略》三卷，其所收骚赋，也表明了尊崇屈骚的思想，如《骚略序》谓"《离骚》不可学，可学者，章句也"，屈原"人高、志高，文又高。一发乎词，与《诗三百五》文同志同。后之人沿袭，无复古人万一"。[12](P1)

元明以来的楚辞论著，也多有尊《离骚》为"经"或直接题名"离骚经"的现象。如元代陈绎曾《文荃·楚赋谱》称"《离骚》为楚赋祖"，"《骚经》神情、思精、意真、语趣"；[8](P224～226) 祝尧《古赋辨体》云："宋景文公曰'《离骚》为词赋祖。'……然《骚》者，《诗》之变也。……(屈)原最后出，本《诗》之义以为《骚》。"[13](P27) 明代陆时雍《楚辞疏》说："《风》《雅》既灭，《离骚》继作，人取而经之，《骚》诚可经也。"[14](P162) 此外，明代赵南星《离骚经订注》、刘永澄

《离骚经纂注》等,也都冠以“离骚经”之名。

二、清代《离骚经赋》对《离骚》双重经典地位的推尊

有清一代,楚骚风韵不减,屈子精神犹存,人们对屈辞骚赋的尊崇呈现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均无可比拟的整体态势。这个时代,尊《骚》为“经”成为朝野共识,楚辞学研究开始全面繁荣。早在清代初期,纳兰性德就有《赋论》一篇,叙评屈原《离骚》,说:“《诗》一变而为《骚》,《骚》一变而为赋。屈原作赋二十五篇,其原皆出于《诗》,故《离骚》名‘经’,其所出之本同也。”[7](P266) 康熙四十五年,命大学士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康熙亲撰《御制历代赋汇序》,特别强调“楚臣屈原乃作《离骚》,后人尊之为经”[15](P1)。上行下效,帝王贵胄对《离骚》经典地位的推重,促使屈原及其《离骚》等作品受到清人的普遍重视,尤其影响到了清代的楚辞学研究。

首先,楚辞研究著作甚夥。据当代学者所编《楚辞学通典》载录,清代“楚辞研究专著”就有 78 种[16](P362~400),数量之多超过明代及此前楚辞研究著作的总和。其中除少数论著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17](P180) 等删“经”字而只称“《离骚》”① 之外,尊称《离骚》为“离骚经”的现象较之前朝更为普遍。如王夫之《楚辞通释》、赵献廷《离骚经讲录》、方粲如《离骚经解略》、屈复《楚辞新注》、姚培谦《楚辞节注》、梅冲《离骚经解》、王闿运《楚辞释》等,不仅仍然沿袭着王逸《楚辞章句》称“《离骚经》”的传统,而且有的著作如李光地《离骚经九歌解义》更引《诗经》《尚书》《周礼》等经书注解《离骚》。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学者为《离骚》称经加以辩护,如屈复《楚辞新注》云:“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离骚》有焉,尊之曰经宜矣。”[6](P378) 沈德潜《说诗晬语》曰:“《离骚》者,《诗》之苗裔也。……尊之为经,乌得为过。”[18](P102) 王闿运《楚辞释》新释“离骚经”曰:“依《章句》所言,则《离骚经》犹《逍遥游》,以三字为名,史公不容,剪去‘经’字,而云作《离骚》也。屈子此作,托于《诗》之一义,故自题为经,言此《离骚》乃经义,百代所不变也。”[19](P2) 他们皆通过强调《离骚》与《诗经》关系,来表明《离骚》称“经”的合理性。

其次,咏屈、拟骚的辞赋创作空前丰富。据马积高先生等编纂的《历代辞赋总汇》[20] 统计,该书共计收录清代作者 4801 家的辞赋作品 19499 首,其作品数量比先秦至明代所有辞赋作品一万零六百多首的总和还要多,其中包括有大量以“拟骚”“拟九歌”“拟楚辞九章”“拟招魂”“吊屈”“悼屈”“吊屈大夫”“屈原行吟泽畔”为题的辞赋作品。这些作品拟其语而仿其意,或对屈原致以追悼、赞美,或彪炳楚辞加以申发,或借骚体以表达一己之情,构成了古代《离骚》传播接受史上十分耀眼的一页。

最后,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离骚经赋》创作。在清代,上至朝廷贵族,下至普通文人,纷纷以各种形式解读楚辞、咏吊屈原、赋写《离骚》,作品十分丰富。但是,晚清同题《离骚经赋》的出现却属历史上的首次,这既是清代文士以辞赋形式解读《离骚》经学意蕴的创新性实践,也是《离骚》经学与文学双重经典化历程达到高潮的必然结果。

笔者仅据《历代辞赋总汇》所收艾作模《离骚经赋》(以“骚经九章朗丽哀志”为韵)[20](P17532~17533)、徐有珂《离骚经赋》(以“取镕经义自铸伟词”为韵)[20](P22937)、孙贻良《离骚经赋》(以“取镕经义自铸伟词”为韵)[20](P23042~23043) 三篇同题律赋,作一初步的分析论述,借此窥探清代文人对于《离骚》经学意蕴的理解,及其以律赋形式解读《离骚》的艺术特点。

(一)“览遗编而思君”:《离骚经赋》对屈原遭遇人格的悲悼和崇敬

这三篇同题的《离骚经赋》,所赋写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表达出对于屈原不幸遭遇的悲悼和高洁人格的崇敬之情,则是一致的。

先看艾作模的《离骚经赋》。艾作模(?—1898),字式成,湖南溆浦人,曾入左宗棠、郭嵩焘幕。[21](P145) 溆浦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到达过的地方,《九章·涉江》中有“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的诗句,那里还有屈原庙、三闾大夫祠等历史遗迹和龙舟竞渡的风俗流传,生长于此的艾作模,想必会对屈原有所了解和感怀。他的《离骚经赋》对于屈原的身世行迹和情感历程,都有具体的铺写和阐发,如其赋云:

> 览灵均之遗编兮,极思君而郁陶。班孟、荀以伯仲兮,秉逢、比之志操。际时汚于怀、襄兮,

① 蒋骥《楚辞余论》云:“《离骚》以经名,特后人推尊之词,王叔师《小序》以为‘经’。若系作赋本名,可笑甚矣。他若《九歌》以下皆缀‘传’字,亦属赘设。”

慨独任其忧劳。依彭咸之遗则兮，沅湘鼓其怒涛。心与日月争光兮，气薄云霄以翱翔。哀人世之芜秽兮，振天籁之嘈嘈。启《九歌》余不闻兮，《诗三百》其曲同高。藻摛春而缛绣兮，神秋水而清滔滔。激顽懦使廉立兮，终古闻声而萧骚。

这是赋的开篇首段，模拟《离骚》六、七言长句的骚体句式直抒胸臆。起笔即抒崇敬之情，盛赞屈子与孟、荀不分伯仲的崇高地位和与龙逢、比干相媲美的忠贞品质。作者认为屈子虽身处怀、襄污秽之世，遭受着极大的不幸，却依然葆有义薄云霄、可与日月争光的心气节操；其遗留后世的伟大诗篇，既可与《诗经》齐名并列，更可激发人心，顽廉懦立。

接着，又围绕《离骚》的内容，敷陈屈原遭馋不遇的经历，"何灵修之不察"，"谓椒兰其不芳"，"靳兴心以嫉妒"，"袖又奋其长舌"，一帮邪佞奸人搅乱朝政，祸国殃民，害得"有蛾之女远飏"。屈原最终"以忠直而投荒，辞君门而遐逝"，放流至"澧之浦兮沅之湄"，"宿辰阳"而"入溆浦"。虽内心悲愁，郁结之绪百转千回，却仍然"寄古意兮发安歌，畅幽思兮入新制"，创作了"六经之外"的又一"奇文"《离骚》，"将长留乎天地"之间，令后人无限景仰。

又如徐有珂《离骚经赋》：

原夫屈平之作《离骚经》也，溯高阳之苗裔，叙迁客之萍踪。字有灵均之可绎，名惟正则之是从。既漱芳而多润，亦摘艳而尤秾。非同白雪成吟，羽还可刻；那得黄钟既毁，金复在镕。

作者赞美屈原《离骚经》的创作，溯源高阳之苗裔，叙写迁谪流离的不幸遭遇，含英咀华，秾艳芬润，非阳春白雪、刻羽流徵、曲高和寡之音，却有如良金在熔、千锤百炼，因此得以传唱千古，万民传诵。

（二）"取镕经义、自铸伟词"：《离骚经》合五经之旨的经学意蕴

继承前人以《离骚》兼《诗》之《风》《雅》"取镕经义"的观点，在赋中具体阐发《离骚经》的经学意蕴，是《离骚经赋》的重要内容。

如艾作模《离骚经赋》，在敷陈《离骚》中诗人身世遭遇和心路历程的主旨内容时，又以大量笔墨具体解读了淮南王刘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的著名论断，如"《大雅》不作而哀生"，"《小雅》怨诽而竭诚"，"乐不淫兮哀不伤"，"遗经不烬于秦灰"等。

徐有珂的《离骚经赋》，谓屈原作《离骚》可"比后儒虎观谈经"，"参《小雅》之余音，得《国风》之遗意"，"哀怨作'变风'之旨"，皆意在证明《离骚》的创作和情感内容受到了儒家经典尤其是《诗经》的影响。

而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孙贻良的《离骚经赋》。作者以赋写《骚》，释经成赋，着意对《离骚》进行全方位的经典诠释，整个《离骚经赋》可谓是一篇《离骚》的"经学"专论。先看其《序》曰："《离骚经》者，楚大夫屈平所作。离之言思，骚之言忧，自白其志。而独谓之经者，观其词意，颇有合于《五经》之旨。请赋以明之。"[20](P23042) 孙贻良开宗明义：屈原《离骚经》乃"自白其志"之作，而世人之所以独谓之"经"，是因为"其词意颇有合于《五经》之旨"。

顺着这样的作赋意图和整体构思，赋篇正文逐层展开了叙写。其辞曰：

文阵雄师，词坛盟主。立言则旨远辞文，寓意则感今怀古。抉周代《五经》之义，提要钩玄；抒湘累千字之篇，情深志苦。述齐桓而尊汤武，语必居宗；效彭咸而赴汨罗，水哉何取？

这是赋篇正文的第一部分，是为赋之破题、承题。既以"文阵雄师"四句，概括《离骚》的崇高地位及其深远的"立言""寓意"，更以"抉周代《五经》之义"等四对八句，点出题名"离骚经"三字的内在涵义，从而引领下文。

接着是第二部分，即赋篇的主体内容，自"昔屈平之作《离骚经》"以至"屈子独著文章之伟也"，包括第 2 至 7 段，共 6 段 70 余句，约 560 字，基本内容是溯源题意，逐层铺写。具体而言，敷衍《离骚经》合于"五经之义"的主题。先以五个韵段的篇幅，逐一列举《离骚》的词句，分别对应《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相与比附。

"变风"激烈，《大雅》从容。袭《葩经》之清丽，发藻思之薰醲。余情信芳，揽莽则宛同"芍药"；人言何听，搴蘭则"恍咏采葑"。识鸟兽草木之名，类多比兴；兼群怨兴观之旨，自具陶镕。

论道德而述舜称尧，唐虞"稽古"；示鉴戒而惩浇创羿，"椅杌"垂型。蕙亩效于"桐宫"，幽思写湘潭之怨；露饮怀清于水监，文辞比孔壁之《经》。

更若致远钩深，抒词见志。悔遁不殊于"悔厉"，《家人》之爻戒弥深；女婴可喻"娣"兮，《归妹》之象辞备至。岂独筵箸命卜，吉占符蓍揲之文；更看菌桂求芳，同类协"茹连"之义。

而况竟体精严，复通《戴记》。……正则灵均，锡名等"咳名"之赐；昭质秉"松筠"之操，岂余心之可惩。

复有衮钺权操,《春秋》法具。摘词自矢公忠,载笔绝无回护。

上引五段赋文,作者先以发语“昔”字提起,指出屈子作《离骚经》与《诗经》的相通之处:即化用《诗经》词语句意,承袭《诗经》“清丽”之风;其价值功用,“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兼具“兴、观、群、怨”之旨,是对儒家诗教的遵循。而后,铺叙《离骚》“述舜称尧”,以《尚书》中《尧典》《舜典》所载儒家理想圣君唐尧、虞舜的功德言行作参照,继承了《尧典》《舜典》“曰若稽古”、考察前贤的传统。此外,所谓“梼杌”“桐宫”的典故,也出自《左传》和《尚书》“太甲”之篇。第三段将《离骚》之语比附《易经》中《家人》卦爻辞、《归妹》卦象辞。第四段以《礼记》“咳名”“松筠”的典故,认为《离骚》“志洁行芳”“昭质秉操”的修身修德内容,正符合儒家经典《礼记》所倡导的德教修养。第五段所谓“复有衮钺权操,《春秋》法具。摘词自矢公忠,载笔绝无回护”等赋句,则是称赞《离骚》遣词载笔,能够公正客观,张扬正义,具有《春秋》褒贬(“衮钺”)善恶之法,而绝无回护偏袒之弊。

文末总括言之:“凡此《离骚》之情醑,实兼《五经》之文斐。直而无乖,怨而不诽。询造意之独深,岂命名之不韪……故骚人迁客,楚邦虽多放逸之流;而酌《雅》禀经,屈子独著文章之伟。”《离骚》“酌《雅》秉经”,实兼《五经》之义,具有深厚的经学内容和思想意蕴,其以“经”名篇,可谓名副其实。

(三)“翰墨作骚坛之祖”:《离骚经》“宜雅宜风”的文学精神

这三篇《离骚经赋》,在充分阐发《离骚》的经学意蕴、渲染对屈子崇敬之情的同时,也高度赞扬了《离骚》的文学价值和成就,肯定了其“宜《风》宜《雅》”的文学精神。他们与反对《离骚》称“经”者不同,直接以“离骚经赋”名篇,明确宣示《离骚》为“经”的主张;同时,又认为《离骚经》乃“骚坛之祖”,屈原因此享有“词坛盟主”的文学地位。

艾作模的《离骚经赋》,既说《离骚》“直吐辞而为经”,又称其有“词赋之丽则”,可“与《南华》其并绝”;孙贻良的《离骚经赋》,既说《离骚》“颇有合于《五经》之旨”,又尊屈原为“文阵雄师、词坛盟主”,赞叹“屈子独著文章之伟”,“岂徒研京炼都,端庄流丽,含任吐沈,绝妙好词已哉”,对屈原及其《离骚》的文学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而徐有珂的《离骚经赋》谓“读《骚经》而日纪庚寅,诵《骚赋》而韵分甲乙”,更明确地概括了《离骚》“骚经”与“骚赋”一身兼二任的经典特征,从而将自汉代以来《离骚》从经学和文学加以解读的经典化历程推进一个双向并轨的理论终点。

下面,笔者试对徐有珂《离骚经赋》的具体内容作进一步的分析。

徐有珂[22](P813),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字韵誓,号小豁,同治六年(1867)举人,著有《小不其山房集》。其所作《离骚经赋》的内容,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切入,铺叙《离骚》作为“骚坛之祖”艺术成就及其深远影响。

这篇《离骚经赋》是一篇仿唐人八韵之例的律赋,全篇共八韵八段,600 余字。首段总体评说《离骚》的文学地位和艺术特点:

芳草三湘,美人千古。怨记椒兰,香纫蕙杜。词哀丽而弥妍,意缠绵而俞苦。翰墨作骚坛之祖,羌宜雅而宜风;膏腴流经笥之光,任予求而予取。

《离骚》继承《诗经》“风雅美刺”的文学精神,运用“香草美人”的表现方法,呈现出哀丽妍华的语言风格和缠绵苦闷的情感特色,具有辞赋之祖的崇高地位,是历代文学创作效法的不竭源泉。在首段作此解题总说之后,接着铺写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概述《离骚》抒写屈原遭时不幸、进谏陈情的内容主旨。自第 2 段“原夫屈平之作《离骚经》也”至第 5 段“将叩北阙以陈情、上书奚自”,共 4 段 300 余字。如赋文所谓“其旨则历叙升沉,自嗟废置”,“溯高阳之苗裔,叙迁客之萍踪”。屈原构想“假使人非皆醉,我不独醒”,定会“荃犹未化,芷亦同馨”;而身为“左徒供职”,理当“以其词铺张盛烈,以其才黼黻天庭”,进谏陈辞,冀楚王明于辨察,励精图治。然事与愿违,“伤谣诼之多方,怨灵修之见弃。鸠为媒而遇乖,鴆先鸣而芳颓”,“将叩北阙以陈情,上书奚自”,“胡乃独抱微忱,未伸壮志”。屈原在遭馋被贬、进谏无门的重重困境之中,“遂乃托兴词章,寄情文字。悃欤写皦日之诚,哀怨作《变风》之旨”,创作《离骚》之诗,将万千哀怨、无限悲情倾注于笔端。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诠释了“离骚”之义,言“盖骚者抚心感愤,遂传骚客之音;而离者琐尾忧愁,不外离忧之义”,指出《离骚》是抒写感愤忧愁的诗篇。

二是称赞屈原《离骚》等作品芬芳清艳的语言风格和荡气回肠的艺术魅力。即第 6、7 两段,约 150 字。“其词则葑菲言怀,芬芳琢句。沅芷兴歌,江蓠讬赋。蕙纕挹其香清,荷衣完其质素”,“他若《哀郢》凄迷,《招魂》斐亹。搔首《问天》,记词《山鬼》。何如此皎皎素心,依依丹扆。可奈肠迴,非同腹诉”。赋篇作者认为,屈原《离骚》借“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

禽臭物，以比谗佞"的比兴象征艺术，纷芳优美的语言才华，还有《九歌》《九章》等作品的艺术创造，为历代的诗文辞赋作者所喜爱、效仿，不仅"隔世动长沙之《吊》，《鹏赋》雄才；知音入太史之编，龙门词伟"，更可谓"开一代班香宋艳，不费雕锼；括六朝谢草江花，悉供陶铸"。

三是叹评后世对屈原不同方式的缅怀追愍之作，肯定《离骚》乃"骚经"与"骚赋"双重经典地位。末段大抵肯定"后之人汨罗怀古，云梦凝思；忆离情其如诉，望彼美兮何之"的真挚情怀，却以为"《九怀》《九叹》之敷陈，辞乖丽则；《广骚》《悼骚》之模拟，说总支离"。最后以"读《骚经》而日纪庚寅，紫霄降诞；诵《骚赋》而韵分甲乙，黄绢摅词"结尾，并呼应首段。

三、《离骚经赋》以赋明"经"的律赋艺术创新

清代《离骚经赋》的出现，不仅是古代文士以辞赋形式解读《离骚》经学意蕴的创新性实践，而且就艺术形式而言，相对于传统的律赋创作，在命题限韵、用典方式及句式、词语的运用等方面表现出的一些新的特点，突出表现了其"以赋明经"的创作用意。

（一）以命题与限韵字提领"离骚经赋"的创作主题

命题与限韵，是律赋与其他类型赋作不同的基本特征。律赋是命题之作，也是限韵之作。赋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南宋王观国所撰《学林》论"古赋题"时云："夫赋题者，纲领也；纲领正，则文意通。"[8](P189) 南宋郑起潜专论赋格的《声律关键》，论作律赋有所谓"命题、命意、择事、琢句、押韵"等"五诀"之法，并专门论析了"认题"的 27 种方法，可见律赋"题目"的重要性。赋的"命题"明确体现了出题者的思想倾向及创作目的。

《离骚经赋》命题"离骚经"，直接取之于王逸《楚辞章句》的"离骚经"篇名，而以"离骚经"作为赋题则是此前未见的。早在汉代，有命题为"吊屈原"（贾谊）、"反离骚"（扬雄）、"悼离骚"（班彪）及"悼骚"（梁竦）的赋作，唐宋以后也出现过命之为"六艺"（唐封希颜）、"汉章帝白虎殿观诸儒讲五经"（唐李程）、"读《易》"（宋高似孙）、"石经"（明贝琼）等的赋题，但未见有"离骚"与"经"字连词的赋题。

直接命题为"离骚经赋"，不仅明确表达了拟题者既尊《离骚》为经又以《离骚》入赋的双重意向，同时也指向了赋篇创作的具体思想内容。

> 《离骚经》者，楚大夫屈平所作。"离"之言思，"骚"之言忧，自白其志。而独谓之"经"者，观其词意，颇有合于《五经》之旨。（孙贻良赋）
>
> 昔屈平之作《离骚经》也，情陶性淑，词艳意浓。"变风"激烈，《大雅》从容。袭《葩经》之清丽，发藻思之薰醲。（孙贻良赋）
>
> 原夫屈平之作《离骚经》也，溯高阳之苗裔，叙迁客之萍踪。字有灵均之可绎，名惟正则之是从。既漱芳而多润，亦摘艳而尤秾。（徐有珂赋）

命题即为行文纲领，在"离骚经"的导引下，赋篇一方面叙写《离骚》"合于《五经》之旨"的经学内蕴，一方面也盛赞其承袭《风》《雅》之"清丽""摘艳而尤秾"的文学风韵。

所谓"限韵"，是指创作律赋要按规定程序，用一个或几个韵部的限定字押韵。律赋的限韵，有两方面的作用。

其一，是对于作赋押韵形式的要求。清代对于用韵的形式要求十分严格，要求押八韵，且八字韵依次顺押，每个韵脚字都要押在每一韵（段）的最末一句上。如清林联桂《见星庐赋话》说："赋题所限官韵，近来馆阁巨手，固须挨次顺押，不许上下颠倒。而且顺押之韵，每韵俱押于每段收煞之句。"[8](P324) 这三篇《离骚经赋》都很好地落实了这些押韵原则。

其二，是限韵字对于赋题的意义。限韵字并非只是用来押韵的，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谓"官韵之设，所以注题目之解"，还说"其限字，有即以疏题义者，有与题义不相比附者，有限字甚难而遂假借押之者"[13](P343～345) 等，点明了限韵字有注解题目、疏通题义的作用。且看这三篇《离骚经赋》的限韵字，分别是：徐有珂《离骚经赋》，以"取镕经义自铸伟词"为韵；孙贻良《离骚经赋》，以"取镕经义自铸伟词"为韵；艾作模《离骚经赋》，以"骚经九章朗丽哀志"为韵。这些限韵字是对赋题进一步的说明和补述，直接点名题意，指示主题。这三篇《离骚经赋》，选取刘勰《辩骚》篇"取镕经义、自铸伟词"和"骚经九章、朗丽哀志"为限韵文字，限韵字与赋题相配合，二者相辅相成，一起扮演着指引赋篇内容、深化"骚经"与"骚赋"双重主题的重要功能。

（二）切合赋题，选择与楚国相关的典故

《文心雕龙·事类》篇，论用事引言，云"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而择事用典，也是律赋的重要创作手法之一，南宋郑起潜《声律关键》论律赋作法"五诀"之一的"择事"说："何谓择事？故事虽多，切题为

工”。[8](P209)“切题”即为择事用典所要遵循的重要标准。这三篇清人律赋,赋题是楚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经》,赋篇引用的事典,大都与楚国的历史文化和屈原的人生行迹相关。其中,引用的事典不仅丰富繁多,而且化用巧妙,切合赋题,不着痕迹。

如艾作模《离骚经赋》第 4 段,赋曰:“惨淡武关之云雲兮,闻杜鹃而凄凉。彼阖閭与夫差兮,父子接踵而云亡。六千里为雠役兮,胡不独闻有少康?谁踊跃于中野兮,愿提戈为国殇?”这里运用了多个历史典故以咏古抒怀,多与楚国兴亡相关。如“武关”是地名,在今陕西商南县西北,楚怀王三十年,秦昭襄王遗书引诱楚怀王约会于此,并拘执楚怀王入秦;吴王阖閭与夫差父子在吴楚、吴越争霸的过程中,曾先后大败楚、越两国,却最终接踵而亡;“六千里为雠役”的典故来源于《荀子·仲尼篇》的“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是说楚国虽有六千方里的广大国土,却不善保卫,被仇人秦国所占有;这里的“少康”,是指夏代中兴之主姒少康,其父帝相被寒浞杀害后,寒浞篡位,少康逃奔有虞,后少康与夏后氏遗臣伯靡等人合力攻灭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作者质问楚王:难道你就没有听说夏少康复仇兴国的故事吗?你还记得那些拿起武器奔赴国难、奋勇杀敌的人吗?

再如此赋的第 7 段云:“彼庄辛之作论兮,俟补牢于将来;申包胥之长哭兮,郢都为之不摧。”这两个对句,运用了两个有关楚国危亡的历史典故。一是《战国策·楚策四》所载“庄辛谓楚襄王”[23](P174),楚臣庄辛以“亡羊补牢”的民谚讽谏楚襄王发愤图强、收复被秦国所占淮北失地;二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载,吴师攻破楚国后,楚大夫申包胥赴秦国求救兵,“立依于庭墙而哭”,七日七夜“勺饮不入口”[24](P1631),最终感动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出兵救楚。作者运用庄辛、申包胥忠贞为国的历史典故,反衬屈原的爱国衷情不被楚王所理解的悲哀。

这样切合赋题的用事用典,配合了《离骚经赋》主题的表达。

(三)大量化用《离骚》的语辞意象

王逸《离骚经章句》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刘勰《辩骚》亦云:“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奇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诚然,历代文人对于楚辞的艺术技巧,有着全面的学习接受和模仿。

《离骚经赋》也不例外,这三篇赋作大量直接引用或化用《离骚》及《九歌》《九章》等楚辞作品,模拟其语句、辞藻。诸如,艾作模《离骚经赋》中,“芜秽”“纯粹”“沧浪”“濯缨”“昌披”“踵武”“灵修”“侘傺”“辰阳”“安歌”“屏翳”“丰隆”“苍梧”等;徐有珂《离骚经赋》中,“椴”“椒”“蕙纕”“荷衣”,“伤谣诼之多方,怨灵修之见弃”,“鸠为媒而遇乖,鴆先鸣而芳颓”等;孙贻良《离骚经赋》中,“揽莽”“搴兰”“蕙亩”“露饮”“菌桂”,“兰滋畹而蓉盈室”,“荃为茅而椴充帏”等。这些都能让人感受到赋家在模拟《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大量借用《楚辞》中“香草美人”的语词意象,俨然形成了一种有如楚骚那般芬芳烂漫又含蓄蕴藉、缠绵幽怨的艺术风味。

总体来说,清代《离骚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仅从笔者所叙的三篇同题之作来看,《离骚经赋》的出现及其命题、限韵、内容书写和艺术表现,已经将《离骚》从经学和文学双重维度解读的经典化接受历程形象化,并且成为古代《离骚》经典化进程的最终站点,证明了屈原和《离骚》永恒不朽的思想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李诚,熊良智.楚辞评论集览[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何新文,苏瑞隆,等.中国赋论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孟修祥.楚辞影响史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10]陶文鹏,郑园.苏轼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11]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高似孙.骚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3]王冠.赋话广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14]陆时雍.楚辞疏[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 1301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5]陈元龙.历代赋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6]周建忠,汤漳平.楚辞学通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17]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8]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9]王闿运.楚辞释[M].长沙:岳麓书社,2013.
[20]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21]寻霖,龚笃清.湘人著述表[M].长沙:岳麓书社,2010.
[22]傅璇琮,等.中国诗学大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23]贺伟,等.战国策[M].济南:齐鲁书社,2005.
[24]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